

張大千小傳

●巴東

家世與家庭

張大千，四川省內江縣人，出生於一八九九年民國十三年五月十九日（農曆四月一日），他的家世富裕，是內江的望族。父親名懷忠，號悲生，為人個性豪爽，講究美食。原籍廣東番禺，先世於前清康熙年間遷徙入蜀，定居內江，從事鹽業，到了張懷忠這一代，生意做得很大，鹽業以外，又在輪船及百貨業方面發展，同時還經營錢莊，家道十分殷實。

他的母親曾氏友貞是中國傳統大家婦女的典型，不僅主持中饋，兼亦擅長繪事，工花卉翎毛。她治家嚴謹，家規重老尊賢，對長幼有序，不得逾越僭妄的規矩，尤其注重。子女有過輒要罰跪，晨昏晚輩必向長輩請安，侍奉茶羹一沿舊風。這對張大千有很深的影響，他直到晚年仍對長者行跪叩大禮，也接受門生晚輩的跪拜，在謙辭時也常跪下回拜。

謝家孝先生曾回憶，張大千旅居海外時，有一年回國探親訪友，其宗弟張目寒的岳丈尚在世，大千自機場剛抵張目寒家門，未曾稍歇，即行

磕頭大禮，其夫人徐雯波女士緊隨拜下，張目寒夫婦及他岳老太爺回叩答禮，小客廳內匍匐一地，他當時在場目睹，一時之間頗有手足無措之感。

張大千共有兄弟十人，都是單名。大哥張榮，二哥張澤，三哥張信，四哥張楫。張澤就是張善子，亦為有名的畫家，尤擅畫虎，其愛虎成癖，別號虎痴。排行五、六、七的三位兄長早故。張大千行八，本名權，後改名爰，小名季，遂號季爰。他下面還有兩個弟弟，老九名端，字修正；幼弟名璽，號君綬；另外還有個姊姊，閨名璋枝。

兄弟姊妹中與大千情感最親近的就是張善子，他比張大千長十七歲，個性嫉惡如仇，清末參加革命，民初參加反袁，以致兩次被抄家。他雖是排行第二，却如當家長子一般。對日抗戰期間曾奮力宣傳抗日，民國廿七年更隨于斌特使，赴歐美爭取友邦支援，賣畫捐款，為國家出了不少力，至為可敬。

用「長兄如父」這句成語最足以說明張大千對張善子的情感，敬愛以外，多少還有些「憚之

如嚴父」的成份。張善子對張大千的一生，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一方面他本人是畫家，自然對張大千的藝事多有提携引導。大千早年居上海拜師習藝期間，張善子在藝文界之交遊廣闊，提供了張大千許多觀摩學習的機會；另一方面在性情上，張善子具有是非感強烈的個性，有魄力、有自信，喜歡冒險，常不滿於現狀，希求自我突破，並且名心甚盛（見高陽著「梅丘生死摩耶夢」一二八頁），這些都對張大千成長的過程中深有影響。另外，與張大千感情最親的還有他的公弟張君綬。他比張大千小五歲，也擅長書畫，很有才氣，他的師長、兄友對他的評價都很高，但在民國十一年，年僅十九歲的君綬却因故蹈海而逝，這是使大千深為傷痛的往事之一。

由於家學淵源，母弟兄長均擅繪事，張大千從小就開始學畫，據他自己說，尤其是姊姊璋枝對他的教導得益最多。除了繪畫以外，大千十二歲以前都在家塾唸書，亦多由大姊璋枝教導。璋枝在民國前一年八月不幸因病逝世，據此推測大千應是從十歲以前開始習畫。

民國前一年張大千入天主教福音堂教會學校

讀書，因為他家裏是信奉天主教的。明清以來雖然知識份子與西方教士往還者甚多，信教的也有，然在彼時社會背景中信教的家庭仍然非常少，至於大千家中與天主教有何淵源則不得知。

大千有二子取名號為葆蘿、比德，即是與信仰有關。然而可以確定的是，張大千畢生之生活方式與治藝傳承，俱為中國傳統形式，並未受到多少西方宗教文化影響。

民國十四年，張大千居上海時，家中事業迭遭嚴重打擊，首先是張家創辦的福星輪船公司出事，其所屬的一艘輪船，在三峡中撞翻了貴州軍閥袁祖銘一艘武裝走私的運鹽木船，船上的一連兵全軍覆沒，黔軍當時在四川勢力很大，袁祖銘索償，派人到四川查封了張家許多產業，使其元氣大傷。更糟的是張家與人合作的公司，在蜀中號稱「三張事業」的輪船、百貨、錢莊等公司，被人玩了空頭花樣，到了端午節前後，週轉不靈，於是張家事業就此倒閉。

就在同年（民國十四年），張大千的尊人懷忠公亦過世，是否與家道中落有關，不得而知。然而此時張大千年屆二十六，雖在上海畫壇小有名氣，但迭遭家變，庇蔭盡失，往後的前途發展都必須靠一己的努力了。

生平與交遊

張大千的一生經歷了八十五年的漫長歲月，生於內江，逝於臺北，要歷數他的生平事蹟，實非短章所能言盡，可謂豐富多姿的一生。本節概分為兩個時期來敘述之。

一、大陸期間（一九一六—一九四九）

他少年時（民國五年）在重慶唸中學，假期返鄉時，由於地方、鄉野的時局混亂，被土匪綁票，險遭大難，後來由於讀過書，會寫字，被迫成為土匪的師爺，歷險百日方始脫困逃出。在與土匪生活三個多月的日子裏，使他在少年時代即已深刻地體會到生命瀕臨生死之艱險，也讓他感受到生活生命中不同層面的意義。

民國五年大千自四川赴上海，本意在上海學習書畫，但家裏不同意，第二年隨即奉父兄之命與二哥善子留學日本，在京都學習染織，他到日本學習染織之目的，據推測可能與張家事業有關。

在他留日時有樁事值得一提，據他自己說，在日本認識一個名叫朴錫印的韓國人，是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同學，說得一口流利漂亮的英語，張大千欣賞之餘，更覺得日本人英語說得難聽。當他率直地說出其感想時，不意日本人的回答竟是，「亡國奴的舌頭是軟的，要伺候人家，當然得先把外國話講好。」為此張大千倍感刺激，決定不學日本話，雇了一個在天津長大的日本人當翻譯，「伺候」他讀書。

兩年後學成歸國，張大千雖然把染織學得很好，但却不甘於做一名染織廠的技師，他衷心所願是做一個畫家，而傳統的中國文人畫家，必兼能詩、書、畫三絕，缺一則難躋於一流名家之列。張大千有深厚的藝術天份，繪事自小家學淵源，詩靠博學強記的功夫倒也還足以應付，唯獨題畫的書法無法得心應手，因此拜在當時上海極負

盛名的兩大書家之一——曾熙門下學習書法。

就在同年（民國八年）年底張大千却投身松江禪定寺做了和尚，主持逸琳法師為他取了一個法名「大千」，亦即這位舉世聞名的中國畫家名號之由來。至於他出家的原因，據他自己說是為了自幼感情很好的表姐謝舜華，也是他的未婚妻病逝，悲痛逾恆因而遁入空門。

其實這不過是藉口，張大千出家的真正原因在於現實生活上的壓力。他由日返滬時，放棄了學有所成的染織而致力於書畫，年輕人急於功名就之心可以想見。然而書畫之道無速成之法，且他雖在曾熙門下習書，但曾師由於學生多，並無時間仔細傳授書藝，平日於師門侍師與友人談書論畫雖頗能增博見聞，然於藝事並無實際進展。徬徨苦悶之際，復受感情刺激，遂令其一時衝動而出家，其實這是期盼突破困境的另一種做法。

然而張大千熱愛生活，根本就不會有什麼看破紅塵的想法，因此算算前後做了三個多月的和尚，旋即自西湖靈隱寺返上海，並為二哥善子逮回四川，但這段因緣却對張大千的一生有相當特殊的影響。他在當和尚時經歷到現實生活的窮困，受了不少委屈，使他立志非得要出人頭地，超人一等不可。他說「和尚不能做，尤其是沒錢的窮和尚更不能做」，如此就非得有「經營治術」的處世本領不可；另外，自此他以佛門中人自許，以「大千居士」名號行世。

其後當家人尋回大千，大概是為了要他定心，旋即在母兄作主下與原配曾慶芬結婚，時大千

已先有「偏房」，並育有二子。偏房名叫黃凝素，與曾氏一胖一瘦，子女們便有了「胖媽媽」、「瘦媽媽」的暱稱，以為區分。

婚後回到上海，再拜清道人門下學書，「清道人」即李瑞清。他與曾熙是好友，兩人同為前清翰林進士，不但俱擅魏碑，通曉書法各派源流，中國傳統的學養更為深厚，人品高潔，是張大千一生中最崇拜的人，而這種傳統士大夫階層的人文背景在張大千的一生中發生極大的影響。張大千相從清道人僅一年，清道人即已下世，但大千從其學書獲益匪淺。由於清道人的啓發教導，他在書法上終有所成，因以奉之為恩師，終生景慕。

此外，張大千在上海這段時間已開始收集古人名蹟，這是項耗費頗高的雅癖。某回他買了批書畫，無奈缺少八百銀洋未付，賣主催討甚急，一時無處籌措，正在焦頭爛額之際，曾熙找了個名目，順道過訪，把八百銀洋送來，化解了張大千燃眉之急。感懷老師體念恩情，自不在話下，但更給他為人處世方面極大的啓示。錢財固然是身外之物，但師友相處間之風義，有時亦得在錢財上表達。因之，清道人告訴大千，錢財可以稱為「雅根」。而如何應用「雅根」以顯風義倒還容易，張大千對朋友的慷慨，那是有名的；但如何經營以致「雅根」，那就得憑本事賺錢了。

張大千居上海期間（民國十四年前後）賺錢的本領是賣畫，然賣自己的畫收入有限。而對張大千來說，若是仿石濤的筆墨，無論款印，處處亂真，即使列入石濤的真蹟中，亦為精品，但如

題上「大千張爰仿石濤」這一行款，就賣不起價錢了。這實在使得年輕的張大千十分不服氣，明明無分軒輊的筆墨，何以一具真名便不值錢？如果收藏家們誠實地表示：「張大千的畫雖然跟石濤不相上下，不過名氣相差太大，所以價錢亦不高低」倒也罷了，偏偏鑑賞家們還硬充內行，屢指某筆樹木差了，某處山石氣韻弱了，如何如何不及石濤，豈能令大千心服？

因此在年輕氣盛之下，為了一顯本事向鑑藏家的眼力挑戰，張大千遂造石濤的假畫來賣大錢，也並不覺得問心有愧，這即是他早年偽造石濤畫作的最大原因。但他倒也挑選「買主」，要找有錢而性好揮霍者，不但賣得起價，而且比較取不傷廉，譬如當年上海的「地皮大王」程霖生。他也曾為了逞強，讓北方的大收藏家羅振玉上當難堪，這些雖然都是張大千年輕時血氣之門，但却因此得罪不少人，久為清議所不容。他到晚年也頗為之介意，雖經長年之補善，仍為多人苛議，是其平生憾事之一。

此外，張大千在這些年中（一九二〇—一九三〇）傾交了不少至友，如才女李秋君，詩人謝玉岑，畫家吳湖帆、葉恭綽等，這些人對張大千的藝術天份均十分推重，因此有形無形間督促，鼓勵了大千藝事之進益。

李秋君是張大千一生中最高傲的女性，他們相識於民國九年，彼此極傾重對方才氣，情感甚篤，無奈大千當時已有妻室，因此將感情昇華，寄託於友情與書畫治藝等情操上，他們相互期許交往尊重的態度，極度令人心儀。李秋君于民國

六十年病逝上海，家人初隱瞞大千，後來他聞訊，大為傷痛。

謝玉岑則有江南才子之稱，工詩詞，非常欣賞張大千的藝事，大千謂「愛予畫若性命，每過齋頭，徘徊流連，吟詠終日」，但他享年未過四十，即於民國廿四年因肺病去世。在他病中，大千每隔一日必往探病，「往必為之畫，玉岑猶以為未足」，因此為娛病友，大千力求畫得多、畫得好，如此則間接督促其用心於藝事。他們交往的經過，大千於民國卅年所作的「謝玉岑遺稿序文」，記述甚詳，晚年他在臺北回憶昔年往事，在舊作中跋其感傷，「先友昆陵謝玉岑與有同嗜，每見所臨，輒為嘆贊，以為三百年來能得陳徐三公（指徐青藤、陳自陽、陳汝循）之髓者，獨予大千也。玉岑往已，展示此卷，奈何，奈何。」

當謝玉岑自知不起時，曾鄭重地以愛弟相託，授其藝事，大千亦不負友人之請，對之另眼相待，民國廿九年更力邀玉岑之弟同赴敦煌考古，此人便是今大陸上的書畫鑑賞家，亦為研究敦煌知名的學者謝稚柳。張、謝二人之情誼，由其胞弟延續了數十年，直到大千下世，始終不渝。

吳湖帆（一八九四—一九七〇）長張大千五歲，大千在其「四十年回顧展序文」中首舉吳湖帆「山水竹石、清逸絕塵」遠過於自己。大風堂珍寶「江堤晚景」，除張大千本人題跋外，僅四人題記，吳湖帆便是其中之一，可見其推重之心。吳湖帆精鑑藏，治藝主張詩書畫並重，對張大千治藝之道影響極大。現在紐約精鑑的收藏家王

季遜、大陸的徐邦達都是他的學生。

與葉恭綽的交往，張大千在「葉遐庵先生書畫集序」一文中，曾詳述其情，確有令人為之心折處。葉公綽處世的「風義」，亦必然深深影響了張大千為人處世慷慨好義的態度。

葉公綽比大千長十九歲，張以「丈人行尊之」，情誼介師友之間。民國十七年教育部籌劃第一次全國美展，張大千應聘為審查委員，與葉公綽共事，因而訂交。他與張大千結隣而居蘇州網師園近四年，談書論畫，嘗勸張大千專攻人物，以振近世人物畫日頹之弊，張大千西去敦煌臨摹壁畫，自謂乃受其啓示。

張大千記述：

「予少略不檢束，頗好博戲，江紫塵丈於上海孟德爾蘭里，創詩鐘博戲之社，當時老輩如散原、太夷、映庵皆在局中，予雖復儉，亦無日不往，無日不負也。先曾祖舊藏王右軍曹娥碑，唐人前後題名，前為崔護、崔賈、馮審、韋臬四人；後為楊漢公、王仲綸、薛包三人，而王書久佚，項子京，成親王先後所藏，並有詳跋，江丈索觀，携共賞焉。當夜入局大負，金盡，向江丈貸二百金，才數局，又負盡；又數貸數負，瞬逾千金矣。江丈笑曰：『此卷其歸我乎？再益二百金可耳。』以是逕歸江丈，而予以輕棄先人遺物，中心悔恨，從此絕跡賭肆。」

張大千因打詩迷博戲，失却先人的傳家之寶「曹娥碑」，遂「從此絕跡賭肆」，其痛悔之情，不難相見，然而仍有下文。

「閱十年，先太夫人病居皖南郎溪，家兄文

修之農圃，予與仲兄，仍居吳門，每週輪次往侍湯藥，太夫人病勢日篤，忽呼予至榻前，垂詢祖傳之曹娥碑，唐人前後題名，何久不見之，殊欲展閱。予惶恐極，不敢以實告，詭稱仍在蘇寓。太夫人謂次遇必須携來，小慰病情，予亟唯唯。此卷聞江丈早已售出，輾轉不知落於何所？中心如焚，將何以覆老母之命？」

張母索閱「曹娥碑」時，病情已勢將不起，若不能了其心願，即為含恨以歿，大千亦必將終生負疚，因此自是惶恐萬狀。他又說：

「迨歸網師園，先生與王秋齋即來省問。予當以母病篤告；又以此最痛心事，並將此卷經過，歷歷述之，倘此卷尚可求獲，將不惜重金贖之，即送郎溪，使老母得慰。先生即自持其鼻云：『這個麼，在區區那裏。』予喜極而泣，即挽秋齋於屋隅而求之曰：『譽虎先生非能贖文物者，予有三點乞與商求之：一、如能割讓，請以原值償。二、如不忍割愛，則以做藏書畫，恣其檢選，不計件數以易之。三、如兩俱不可，則乞暫借二週，經呈老母病榻一觀，而後歸璧。』秋齋即以予意轉告先生；先生曰：『烏！是何言也！予一生愛好古人名跡，從不巧取豪奪，玩物而不喪其志。此為大千先德遺物，而太夫人又在病篤之中，欲一快睹，予願以原璧返大千，即以爲贈，更勿論值以物易也；此卷不存履道園，棄之上海，明日往取，三日內即以報命。』予與仲兄聞之感激淚下，趨前叩首謝，太夫人彌留之夕，幸得呈閱。予罪孽深矣！先生風慨，不特今人所無，古之人亦所未聞也。」

這確是一段佳話，也充分說明葉公綽對張大千的欣賞與愛護。張大千好友朋友是其愛熱鬧的個性使然，但真正讓他心悅誠服的則僅爲少數，如上述諸人。

張學良也是張大千生平極敬重的朋友之一，他們相識於民國廿三年前，肇因於少帥也嗜好古書畫，但所收購的名跡中却有許多是張大千的狡黠；當時在北平，少帥可謂權傾一時，他突然邀張大千吃飯，不明其意，使大千及家人著實捏一把冷汗。不料見面相聚甚歡，毫無介隙；少帥的胸襟氣度使大千大感心折，乃成至友，晚年尤時相往還。

此外張大千生平所交的好朋友至多，例如張目寒，以及民國廿年前後陸續與徐悲鴻、張羣、曾克鼎、方介堪、于非庵、溥心畬、黃君璧等人結爲莫逆，或在藝事上切磋，或在爲人處世上砥礪，都給予張大千或多或少之影響。前述諸人除了徐悲鴻、溥心畬較早逝外，其餘大都與大千維持了近半世紀的友情，直至晚年。

張大千生平除了書畫治藝以外，另有三個重要的嗜好；第一是旅遊，第二是講求美食，第三是愛聽平劇。

他足跡所至幾遍佈全世界，極好遊山玩水，增博見聞，拓展心胸，他曾三度遊旅黃山，並在民國廿八年潛居青城山近三年。

他又極講究美食，在大風堂中跟過他的掌廚都是四川飯店中一流的廚師。據他自己的說法是：飲食的欣賞是一種直接經由感官接受的品味方式，如果連屬於這種敏銳層次最低的品味能力都

不具有，如何能具備敏銳度極高的藝術欣賞能力？此說雖未見合邏輯，但也自成妙理。張大千本人亦善於掌杓，偶而邀宴好友，興之所至，也下廚親自調理。在臺北張大千紀念館——「摩耶精舍」的飯廳牆上，就掛著他用書法所寫的邀宴菜單（臨本）。

此外，他的另一大嗜好就是聽戲。戲曲不但 是中國最偉大的藝術之一，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份。他曾久居的上海、北平兩地即是中國菊壇中心，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升斗小民無不好之。

張大千隨曾、李二師學藝時，正是平劇泰斗譚鑫培如日中天的全盛時期。老師清道人即曾對他說，譚叫天的唱腔有一波三折之妙，與書法有神氣相通之處，應多聽他的戲，玩味其中奧妙。

民國十九年前後張大千在北平更與平劇結下不解之緣，聽戲以外，還和許多平劇名角成爲莫逆，如鬚生泰斗余叔岩，四大名旦中的梅蘭芳與程硯秋，還有名鬚生馬連良，以及後來的孟小冬。

當時的名伶人文學修養很高，余叔岩寫得一手好米字；梅蘭芳人品高尚，曾隨齊白石學畫；程硯秋則書畫鑑賞的能力很高。

此時張大千客居北平邂逅了他第三位夫人楊宛君，兩人並於民國廿四年結婚。

民國廿六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張大千身陷北平近兩年，後經由上海轉赴香港逃出，復經貴州與徐悲鴻同遊桂林後，返回四川，隱居青城山。

民國三十年張大千至敦煌臨摹壁畫達兩年六

個月，此行奠立了他畫風成形的重要基礎，收穫很大。不過也因為人事上的糾葛，爲人惡意中傷，衆口相傳，使他蒙上「敦煌盜寶」的惡名。此項流言，雖歷經當年同在敦煌的多位證人力辯其誣，但公衆寧可相信其「敦煌盜寶，毀壞古蹟」之說屬實，而罔視其「維護古蹟宣揚國寶」之功，使張大千爲之困擾多年，深有餘恨。

今人李永翹先生曾爲此重公案深入查訪，找出當年官方記錄及資料加以調查整理，並赴敦煌實地訪問二次，列舉人證、物證，力辯張大千所受之謗。

民國卅三年張大千在成都，重慶展出敦煌摹作，十分轟動，也引起國人注目敦煌文化古蹟；次年更於成都展出盛年力作，四屏「墨荷」、八屏「西園雅集」等巨構，深受國內畫壇矚目，聲名不脛而走。

二、移居海外以迄返臺（一九五〇—一九八三）

民國卅八年大陸局勢逆轉，張大千由成都逃難至臺灣，旋即轉赴香港。張大千是個入世的藝術家，所以他所居停之處必得要安定自由，繁華富庶，如此藝術文化方得以發展，他才能創作與實畫生存。這在大陸共產政權下勢不可能，而臺灣當時安全可保，安定富庶則談不上，因此張大千赴香港，擬選定一處地點供其發展。他所選定之處是印度，因爲印度於戰後剛獨立，是個有資本且極待發展的大國，憑張大千「經營藝術」的能力，要求名利不是件難事，況且他與當時駐印度大使羅家倫是舊識，也可有個照應。

不料印度尼赫魯極其現實，率先承認中共，連羅家倫大使都要下旗歸國了。最怕和共產主義打交道的他，迫不得已只好暫居印度大吉嶺，過了一年多的山林隱居生活。這段時間雖然也用功於詩畫，但生活所需却多靠他賣所收藏的古畫，使得生活陷入拮据困境，是他一生中較低潮的時期。

研究張大千在大吉嶺所作的詩稿，可得知他當時在大吉嶺住不下時，即想來臺灣，後來沒有成行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就是：中共極力發動他在大陸上的親友家人想讓他回大陸，甚至派他的子姪至大吉嶺遊說，而此時又有兩名相隨於大吉嶺的門生投共，這些都造成他很大的壓力。最後張大千乃決然前往與共產主義最不相干的南美洲發展。這對一個傳統的中國文人來說，實在需要相當大的魄力與勇氣。但從大陸後來發生的浩劫「文化大革命」來看，不能不說張大千是一個有遠見的人。

民國四十一年初秋，想要避開亞洲政治局勢紛擾的張大千，經由一個當年密切往來的朋友在香港賣去大風堂最寶貴的兩張收藏「韓熙載夜宴圖」及「董源瀟湘圖」，做爲行程治裝之資，然後率同子弟門生自香港啓程赴巴西。此行多少有些破釜沉舟的情懷，因此準備相當充份，帶去黑白猿六隻、波斯貓、雜色貓各四隻，名犬四頭，箱籠論百計，據說氣勢頗爲驚人。

到南美後先在阿根廷的曼多瀾(Mendoza)地方住了近一年，旋又移居巴西聖保羅附近，闢建了一處中國式的園林「八德園」，他一共在巴

西僑居了十六年（一九五三—一九六九）。

在僑居巴西期間，張大千曾於民國四十二年首度訪美。民國四十五年四月又在東京展出敦煌壁畫臨作，彼時巴黎羅浮宮博物館館長薩爾正好在東京旅遊，對張大千發生興趣，於是面邀他去巴黎，並於六、七月在東京博物館舉行張大千敦煌摹作展、羅浮宮東畫廊舉行新作展，當時西畫廊是馬諦斯的遺作展。這次巴黎展覽促成張大千首次赴歐旅遊，同時會晤畢卡索，使他接觸到新文化領域的視覺刺激，成爲其畫風不變的另一次機緣。

民國四十九年張大千在歐洲舉行巡迴展，包括巴黎、布魯塞爾、雅典、馬德里；民國五十年又於日內瓦展出新作，更在巴黎大規模地展出巨幅荷花特展，建立了張氏在國際間的名聲地位，從此他不斷在歐、美、亞等地開畫展，並旅遊於世界各地。

民國五十八年張大千自巴西遷居於美國加州卡邁爾（Carmel），一方面是因爲巴西政府闢建水壩欲征收他的土地「八德園」；其二乃因彼時張大千健康情形欠佳，赴美定居便於就醫；三則是在美的華僑老朋友多，因此性好熱鬧的張大千決定赴美定居。

加州的卡邁爾地區濱海，風景秀麗，張大千先住於「可以居」，後因過於狹窄，遂又購築了另一處中國式的莊園「環筆盒」，此典語出左傳「筭路繼踵，以啓山林」，顯示了張大千重新營建家園的艱苦心情。他在美共居住了七年。

晚年的張大千生活家計很重，除了在美之生

活開支、巴西聖保羅「八德園」內仍有家人子女外，他對留在大陸上的親屬尚有定期的經濟援助，總計幾十口人都靠大千畫費維持，然而此時他已上了年紀，時有「葉落歸根」回返家園之想，這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

張大千在海外近三十年，雖然中共爲了政治宣傳的目的，百般籠絡，從未停止過策動張大千返回大陸的活動（甚至於在他過世後，中共當局矚目與新聞報導有勝於生前），他生前無論在印度、香港、巴西、美國，中共均屬派其子女親人往返勸說，只求他回去觀光也好。然而他從未動搖過他的決心，一直心向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堅決表明其反共的政治立場。

因此雖然他在大陸上仍有衆多親友，但勢不可能回到大陸在共產政權統治下生活。反觀臺灣自民國五十九年代以後經濟起飛，民生富庶，再加上另一重要的理由；即張大千的健康情形欠佳，他有眼疾、糖尿病、心臟病，在美就醫時常不能盡於妥善的照顧，而在臺灣由於朝野對他的重視，往往能在臺北榮民總醫院得到週全的醫療安排。因此，張大千不願諸多的困難，毅然決定回臺北定居。

按張大千長年居住國外，早可擁有多國外籍護照，且中共於民國五十九年以後對外的統戰政策日益改變，憑張大千的國際聲望，加以他經營治術的能力，大可來回於臺海之間，左右逢源。然而他却於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年）毅然回臺定居，此生終未返回他朝思暮想的大陸家園。這是中國文人傳統的氣節表現，也是張大千一生

中最爲可敬之處。

中國傳統的文人士君子，無論治學或治藝都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俱視詩文書畫爲「餘事」，所深自看重的乃是爲人的「忠孝」與「氣節」，縱令他們爲人所重的乃是他們的藝事。明代畫家崔子忠的忠貞殉節即爲顯例，張大千亦然，「殷勤說與兒孫輩，識得梅花是國魂」的情操，也充分表現出這爲人所不易深知的可敬傳統。

返國定居的張大千，於次年遷入臺北外雙溪他所籌建，佔地五百多坪的新居——「摩耶精舍」。張大千在臺北雖然家計極累，但生活上與許多昔日老友時相往還，如張羣、張學良、立法委員王新衡、新聞界的前輩樂恕人以及藝界的臺靜農、黃君璧、王壯爲等諸位先生，使得好朋友愛熱鬧的他，晚年也過了一段愉快的生活。由於愛平劇，他回到國內也能盡興地有多看戲的機會，亦因而提携了一些平劇界的年輕後輩。

在臺定居外雙溪的這段期間，除因生活所需，更因其晚年的創作力依然旺盛，所以書畫的作品依然豐富，在他有生的最後一年，更繪製了他生平最大的一幅作品「廬山圖」，可見其對藝術追求與挑戰的熱誠始終未減。

民國七十二元月二十日，臺北歷史博物館舉行其盛大之回顧展，展出他畫了一年多的「廬山圖」鉅卷，大千本人並於開幕時親蒞會場。或係因繪製此作耗費了過大的心力，於三月八日因心臟不適住進「榮總」，歷時近月，終以心肺衰竭於四月二日上午八時十五分病逝，享年八十五歲。消息傳出，朝野震驚，身後極盡哀榮。故總

統蔣經國特派員慰唁家屬，黨國要員主持治喪；國內外新聞爭相報導，海峽兩岸的喧騰矚目，可謂僅次於元首喪國。然據悉其喪葬費用多係至交張羣岳公所籌，其身後兩袖清風如此。故總統經國先生輓額「亮節高風」一語，實當之無愧。

大千遺體火化，靈骨安葬於臺北外雙溪摩耶精舍「梅丘」立石之下。遺囑將「摩耶精舍」和他的古代繪畫收藏全部捐贈國家；他本人的書畫作品則由遺孀及子女共十六人均分。

張大千曾兩次對故宮博物院大規模致贈書畫收藏；第一次在民國五十六年（一九六七），捐敦煌摹本六十二件，其中不乏大件尋丈之作。他的敦煌佛畫在一九八二年香港蘇富比公司拍賣一幅達十二萬一千港幣出售，以此推算，此次捐贈之作品價值即達港幣七百五十萬元之譜。第二次於身後遺囑將他所收藏的古代書畫藏品共計九四件悉數捐出，其價值更是難以估計，僅兩件敦煌絹畫即已不貲其價，遑論其他；其為人之慷慨寬濶，放眼天下亦屬罕有。

大千遺族至為可敬，秉持大千遺言，促成這次捐贈，無所留難；花費許多心血錢財構築的「摩耶精舍」也捐獻政府。由「故宮博物院」管理，改稱：「張大千先生紀念館」。

張大千平生凡四娶，原配夫人曾慶蓉已逝，二夫人黃凝素因故離異，三夫人楊宛君現在大陸，以及離開大陸後一直在身邊照顧他的徐愛波夫人。子女共計十六人，其中長子心亮、六女心碧，早夭，八子心健亦歿於民國六十二年，只是張大千一直不知道。身陷大陸的子女有心智、心玉、

心珏、心瑞、心慶、心裕等六人；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子女為心一、心澄、心夷、心印、心嫻、心沛、心聲，共計七人。

張大千治家嚴謹，無論身在國內海外，兒女皆守傳統禮教家規，極重孝道。唯均不過問子女婚事，此乃基因於大千胞弟張君綏，早年即因父母媒妁之言釀成悲劇，切身之痛促其對子女之前程喜好，悉由其自行作主。

張大千其人其個性

張大千的個性十分豪爽，待人處世十分「四海」，非常喜好朋友，王壯為先生形容他是「一生最識江湖大」，作家高陽則說他是「最會弄錢，也最會花錢的享樂主義者。」「最慷慨，也最體貼的好朋友；以及很講究傳統倫理的內涵與形式的一個『山人』。」，這些看法都很有道理。

張大千確是一個十分熱情的人，個性極其豐富，為人尤重情感，這可由他「謝玉岑遺稿序文」與「葉遐庵先生書畫集序」二文中明顯看出。

在他晚年每每觸動其鄉思及親情之時，往往感傷地淚落盈眶，譬如當他一提及曾、李兩位恩師時。

他在年少的時候，年輕氣盛，亦好逞能，因此有石濤真假畫之事，得罪了許多人。隨著閱歷的增長，雖懂得了為人處世的圓熟精到，但另一方面個性上仍然是好出風頭，喜歡「玩帥」。下面引文可同時說明他的這種個性以及才氣：

「抗戰前一年，高劍父在上海舉行畫展，某君宴客，飯後，先請劍父與大千合作一幅。劍父

素來最怕即席揮毫，表示謙遜，不肯動筆。大千却樂於當眾表演，先作花卉、樹幹奇挺，配以枯枝敗葉，斜陽衰草，純用劍父筆法，看者莫不叫絕！劍父也說極好。大千隨即署款「劍父」，與高的字跡一式一樣。大家看了都以為：如非親眼看到，誰能辨別真偽？劍父却略皺眉頭！大千乃從壁上取下畫來，即在題款處補成：「戲仿劍父先生筆法，愧未能得其萬一為憾，大千居士」，眾為之嘆服。」

從此處可見出，張大千雖是好出風頭，搶了他人的光彩，却在細微處也顧全了他人的顏面，這是他做人的圓熟，也是他待朋友的體貼。高隱先生說：「大千先生是個非常好勝爭名的；但又要好勝而不樹敵，爭名而不見妬，這就非有一套過人之術不可。其用心之深之苦，看看『紅樓夢』的王熙鳳，可以想像一二。」此論確然，然而不願意傷害別人也未必全是怕「樹敵」與「見妬」，個性上的體貼敦厚實為主因，這其實是「一體兩面」的關係，也是張大千特殊的個性；他在敦煌臨摹壁畫時無論大小，若由門人子姪甚或喇嘛同繪，必於落款處署明，足見其人風範。

再舉一例來見出張大千之性情。張大千在公眾場合，每提起敦煌古蹟便稱「我認為歷史考證之價值，重過藝術欣賞。」他如此聲明之用心，實難為外人所了解。事實上敦煌的偉大古蹟，是我國古代先民幾千年的心血結晶，也是集體藝術的寶貴遺產，早於西方「文藝復興」時期上千年之久，張大千本人是畫家又精鑑賞，焉有不知其在藝術上之偉大成就？他自己在為文論述或言談

間屢屢透露出來，對敦煌古人藝事造詣之偉大深為嘆服，事隔多年猶未能已；而凡是到過敦煌的藝術家，沒有不為古人那份精采卓絕的功夫嘆服的。因此，歷史考證的價值固然極其重要，然以張大千的立場，何由矛盾地屢出此言？

究其原因，乃在於大千當年入敦煌臨摹壁畫以後，在成都大規模展覽，廣受國人矚目，鋒頭甚健，亦引起當道重視，教育部則因而成立了敦煌藝術研究所。至此，凡提起敦煌必連帶提及張大千。因此，一來為減少張大千當年備受「樹大招風」之患；二者大千本人即為畫家，若不如此外表態，勢被謂為本位主義以顯聲名；三則若誇大其藝術上之成果，易引起文史學界矜才使氣者之不滿，且亦可避免國人忽略對敦煌藝術遺產之重視。故其呼籲國人重視敦煌文物時，必強調其歷史考證之價值，其用心之深苦，可謂至矣。

因此，張大千有其極世故圓熟的一面，也有其極天真純厚的一面，端看他面對的是什麼人、什麼事。如果碰到的是如財閥、劣紳之屬的淺人、妄人，則好作狡黠以欺之；而對待朋友則極講義氣，真可以「古道熱腸」來形容了，晚年更是力效「沈石田故事」，對有所求而來的人，盡其可能的予以幫助。某回一位老畫家歲暮難以過年，拿了十張白紙託薛慧山拿給張大千畫些人物，以便他再去補景，張大千稱諾繳卷。過後幾天，老畫家挾了合作完成的作品再來，竟又當面請問「可不可以統統署上你一個人的款？」大千仍欣然應命，一揮而就之。

他的生平至交張目寒過世，他為照顧其後人

生活，實畫得款新臺幣四百四十萬元，悉數供其遺族生活之用，與朋友交，擲萬金資業，輕車馬衣裘如此。

大千晚年家計甚累，與畫家席德進素未相識，聽到他病危，立即致贈慰問金新臺幣廿萬元；又聞知席德進企盼他一幅墨荷之作，大千即連夜畫成裝裱送至席氏榻前，娛其病中。

他的個性非常好動，極有魄力與毅力，勇於對生活突破與挑戰，從他跡涉千里在敦煌生活近三年，以及大江南北的旅遊即可看出。他後半生旅居南美，幾乎跑遍了全世界，晚年定居國內，更以八十三高齡開始繪製高近兩公尺，長達十餘公尺的巨製「廬山圖」，令人不能不佩服其精神毅力，這實為其個性使然。

大千對於自己的藝事其實是十分自負的，他認為他的繪畫功力橫古跨今，足可與古人相比。但這點只有在他畫上的題款及與至親好友的談話中才會偶爾顯出，至於對外他則十分謙稱，這倒也並非虛偽，只是中國傳統深以為這是為人的美德。前者例如張岳公曾和張大千談論過現代人物佛繪的名家丁雲鵬的藝事，大千評為「不行」，問他何以不行？他說「畫人物的線條交代不清楚，再問何以如此？則答「勾勒不行」。他更在其「幽壑鳴泉圖」一作中自題「此幅宋人有其雄奇無其溫潤，元人有其氣韻無其博大，明清以來毋論矣。」可見他根本就認為他的藝業足以追宋元，與古人並駕齊驅，視明清以來無人。

另外他長年作畫有一個特殊題材，就是喜歡畫自畫像，幾乎從民國十九年後，每年都有這樣

的作品，這在中國傳統的畫家中頗為少見，可能一方面是為了「顯名」，另一方面則大約受了新時代的影響。

張大千還有一項常人所不及之處，即捨得花錢供其所需。那種「千金散盡還復來」的氣魄，與一般的豪富不太一樣，一來他的手中是從來沒有積蓄的，同時這些花費又都是為了他藝術創作之目的。他曾花費五百兩黃金買一幅畫，也曾斥資美金一百七十五萬元於巴西闢建他的園林「八德國」，當巴西政府欲在「八德國」附近建立水壩時，他又毅然率領家人赴美，放棄了多年經營的心血毫不顧惜。這種「開疆闢土」的魄力與放棄時的斷然決絕同樣驚人。晚年定居於臺北「摩耶精舍」，他所喜愛的盆景、花木、奇石全是由巴西、美國等地輾轉運來，和命公子保羅親赴日本採購，苦心經營，花費不可計數。原因無他，只為其心之所愛，能陶冶性情於其中。

這樣的開銷自然易招議論，批評其過於奢華，張大千本人也深深明瞭此點，他曾表示「有人認為我這樣花費太多了，不大合這裡的艱苦精神，不過我以為這都是我的畫換來的，倒也覺得心無不安。」事實上這些地方的花費確實也與他的藝術創作關係密切，他所愛好的古畫、園林以及搜求的古木、花卉、奇石等，都是他長時間觀察、寫生與創作的靈感泉源。此外大千並不收藏其他古玩，例如他極講究印章，却不同許多鑑藏家一般重視珍貴的印材，僅用平常之類的印石。

張大千的個性及為人，真可謂是一個「今之古人」。他與朋友相交，多麼希望同古代的「士

「君子」一樣，在相互雅容禮讓與各自深得分寸的交往下，彼此了解傾許而又瀟灑自然，就如同宋代的蘇軾與黃庭堅。他的舊友朱省齋曾記述一事：

「客冬偶訪黃般若先生于思豪畫廊，適有一人携來苦瓜和尚探梅聯句圖一軸求售，審視之下，斷為大千所作，遂笑而購之。月前大千海外歸來，因出以示之，果其舊作也。相與拊掌之餘，並承加題畫端曰：有人携此求售，省齋道兄一展閱便定為余少時狡獪，且為購之。一發猿臂之矢，遂中魚目之珠，敢不拜服！辛卯二月同客香港，大千張爰。」

這段軼事對研究美術史的人來說，畫上的題記提供了研究畫家的重要訊息；然而對吾人而言，此畫上題記的情趣，却顯示了張大千多麼眷戀中國以往「士君子」的人文社會。

民國七十一年四月廿四日，張大千獲蔣經國總統親自頒贈中正勳章殊榮。證書有云：

「四川張爰，國家耆宿，藝苑宗師，寢饋敦煌，上窺唐宋，不唯淋漓大筆，蔚為國光；亦且襟抱高華，久為世重。特依據勳章條例，頒給中正勳章，用示崇獎之至意。」

證書中「寢饋敦煌，上窺唐宋」八字，不僅表揚了他藝事上的特殊心得，而且從正面來看他在敦煌的成就，亦即在反面為他洗刷了「敦煌盜寶」之誣。此誣傳諸眾口，互四十年之久，至此終獲國家元首之褒揚，應可確信其事為子虛烏有；然筆者至今仍偶為人以此相詢，尤有甚者，更曾親見某學者於一學術演講場合中，公然指陳諷

喻「盜寶」事云，不禁令人深嘆世態人情另贅一章。

民國七十二年四月十五日總統明令褒揚張大千一生藝事：

「四川張爰，著年令望，藝苑宗師，天賦高華，發為繪事，深功博古，妙悟創新。所作自東徂西，馳譽光國，歷名都而展出，拓異域以流傳。遠遊歸來，多難明志，中原海上，下筆成圖，託忠愛於丹青，寫山河之壯麗，探其藝術成就為獨步，於我文化復興為有功，繼往開來，永垂不朽。遽聞溘逝，悼情殊深，應予明令褒揚，用昭文節。」

高陽先生謂「文節」二字有如「諡法」，可視為張大千的易名之榮。我們深信這道褒揚令乃為張大千一生收名定價之斷評，同時也代表一個傳統的中國士人完成了他的自我。

參考資料：

「張大千紀念展書畫集」：國立歷史博物館

編印

「張大千的世界」謝家孝著

香港「大成雜誌」

「梅丘生死摩耶夢」，高陽著

「張大千詩文集」，樂恕人編纂

「形象之外」，馮幼衡著

臺北「中外雜誌」連載「張大千外傳」，歐

宜君著

臺北「藝壇雜誌」

「張大千書畫集」第六集，臺北歷史博物館

，一九八五。

「張大千先生紀念冊」，臺北故宮博物院。

（原載臺北歷史博物館張大千書畫展本文略

有補正）

聖文叢書 月是故鄉明 全一冊

袁守成 著 定價新臺幣一六〇元

四川袁守成先生早歲畢業國立政治大學，歷任縣長、省合管處長、臺灣農會人員講習所教育長、赴非農耕隊訓練班主任，著作等身，閱歷宏豐，本書為袁先生精心傑作，憶述童年往事、求學歷程、從政經驗等；要目有：耕讀瑣記·故鄉風物話射洪·教書生涯·金陵問學記·農政憶往·抗戰初期烽火行·川南風雲·做縣長經驗談·主持四川合作事業·國民大會之回憶·司農往事話桑麻。附錄：追思孫震上將·善良的女強人王純碧等，二十五開本，二百四十餘頁，定價新臺幣一百六十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